

在中国文化的概念中常常误以为“经”就是“典”，“典”就是“经”。其实所有的“经”在出笼之初，不过是一部学说，一家之言。

经的本意不过是书的一种装帧形式，经字的左边是绞丝旁，是丝织品，用丝织品把竹片连接起来就是经书。如有“六经”之说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没被“典化”之前，不是一部书嘛，还不具有“典”的身价，那么，是谁能具备这“一点”把平常弄成“典”的能力呢？是皇权的统治者。专制的皇权需要王道的德政让人敬仰，独裁的统治需要忠孝的伦理让人臣服，这些“经书”恰恰就是“绿豆”似的符号被“王者”看重了，于是就对了，就被当权者视为“典”了。“忠、孝、节、悌、仁、义、礼、智、信、忍”这些“经”之中的基本“元素”都是统治者“牧民”时需要的法典。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民间非主流的部分，它的影响力仅仅在生存状态的范围之内，诸如衣食住行、婚嫁嫁娶、发育好的，也不过是些口头传诵的“故

“经”可阅读，不可当“典”

商都钟鼓 阮直 事、“传唱”、“人物传记”，统治者是不会把它列入启蒙、教化、典籍之册的。若不是现如今实行了保护、拯救的措施，估计往好了说就是死掉的“木乃伊”了。但统治者掌控的“主流文化”就不一样了，但逢盛世，都修史，时局不稳，便读经，历代统治者让我们读的“经”，都是重金组织士人“修订”、“编纂”出来的，可这些“经典”从没有“经典”出“民本”、“人本”、“人性”的普世的价值。

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我也觉得“经”是要读的，但读仅仅作为了解就足够了，万不可把“经”视为“典”。我早年“认识”一位大人物，一辈子读“经”，把“经”读成“典”了，看谁都不顺眼了，一辈子与人斗争，一辈子与人“翻脸”，不放心别人，也一辈子没管好人。若不读那些“经”，就是读点儿《圣经》，都会多些人味、多些仁爱。更何況，有个无法忽略的常识，那就是今天的生活

和“生经”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有着巨大差异的。几乎接近于文化的断裂了，就像有人拿着“半部论语”说能治天下，你就是读出骨髓油来，我觉得也是扯淡。

新时代必须有新的文化与之相应，“经”文时代是王道德政的“经典”，提倡读经的人其实很多情况下只是出于一种激情信仰或文化崇拜，并没有多少理性的思考。如“四书”、“五经”、“六经”、“十三经”之类，似乎是无可置疑的“经”了，可是熟悉经学史的人都知道它们的来历，乃是几经变化的结果，不是自来就如此的。一经当代人解读更是歧义百出，也都有“经”无“脉”了。

我从来就不信，世袭政权养下的士大夫们当年苦读的经书，会适合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投票产生的公务员们再学习。在闪烁着民主与自由光辉的国度里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孩子们手捧线装书，摇头摆脑念念有词，“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不可当典。当今在人类的思想史上，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经典是能拯救一个民族存亡的，比如《圣经》与犹太民族，比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与世界的人性解放，比如《资本论》对劳资双方构成的社会体制的认识，这样的书才是经典，是全世界的经典。

《钱的战争》

邓楠 在韩国，信贷与透支已成为民众的一种消费习惯，但由于信用卡市场的支持体系不到位，风险管理体系不成熟及基础信贷组织架构发展缓慢，韩国信用卡行业一度陷入恶性循环，信用卡市场和信贷市场的混乱衍生出的骗钱洗钱等金融犯罪屡见不鲜。

根据韩国同名电视剧改编的小说《钱的战争》，反映了现代金融背景下个人与个人、个人与机构之间以金融杠杆为手段进行财富转移的冷酷现实，小说的主人公首尔大学数学天才金纳罗过着悠闲生活，但后来被信用卡和高利贷行业步步为营地逼人绝境：父亲因为透支无力偿还，在冷面的信用卡公司和高利贷者逼迫下，用信用卡划破了喉咙，自杀身亡；母亲急需手术费用，却因无线治疗辞世；房子和家产被拍卖来抵押贷款，无家可归的金纳罗从此顶着“信用不良”的帽子流落街头。忍无可忍的金纳罗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下，被迫反击杀死了冷漠无情的高利贷者。因杀人罪入狱后，他结识了被称作韩国高利贷皇帝的独狼哲，当他洞悉了金融杠杆和金钱的本质后，处心积虑拜师研习高利贷和信用卡行业中的信贷与透支技巧及手段。几经锤炼的金纳罗摇身变为冷血的高利贷经营商后，开始了他人人生转折性的金钱之路……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那木纳峰 陈亚伟 摄影

郑邑旧事

据明嘉靖《郑州志》记载：“郑州城区有自西向东流向的金水河、熊儿河。”这两条河虽是地区性的小河流，但因历史悠久，而且贯穿郑州市区，对郑州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历史上在这两条河上修建了一些桥梁就是例证。 清朝年间，郑州兴建一批砖石拱桥。其中清乾隆10年(1745年)郑州知州张铎监工，在毁于洪水的南关熊儿河桥旧址上重建城南熊儿河双孔青石拱桥，至今沿用旧址，重建加固后继续使用。 民国初年，金水河、熊儿河洪水泛滥，不少桥梁被毁，道路中断，一些商贾厂主开始集资兴建桥梁。1915年，位于火车站对面智仁里的郑州东亚第二商场经理王廷如捐款400元，补修西城外一座旧有石桥，该桥位于金水河上，名继善桥(1988年市政在排水管道施工中，曾在二七广场东侧挖出一座青石拱桥，长

历史上郑州城区的桥梁

杜丰芮 王瑞明 约4米，埋深0.7米，桥口刻有“继善桥”三字)。1917年，位于乔家门路东志大蛋厂经理孔卓卿出资翻修临近该厂广街路北口东侧的熊儿河一座木桥为砖石拱桥，取名志大桥。 1923年，老坟岗一带变成了热闹非凡的商业区，原位于长春路(现二七路)南口金水河上的一座木桥显得狭窄，郑县政府筹办民工将木桥改建为两孔砖石拱桥，宽约6米，长30多米，桥两端灯杆上挂有燃油路灯4盏。 1925年，在西陈庄建一铭功园而修建的铭功路南口金水河故道上有有一破烂不堪的小木桥，重建为两孔砖石拱桥，当时成为旧市区通过广武、老鸦陈、黄河南岸的交通咽喉。1927年，冯玉祥二次主豫期间，在修建道路的同时，对长

说“七”

陈永坤 习惯于运用“七”这个数字的民族心理，源于“七”在人体及天地万物中的客观存在及其规律性。《易经》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王弼注：“阳气始剥至来复，时凡七日。”孔颖达疏：“天之阳气绝灭后，不过七日阳气复生，此乃天之自然之理，故曰天行。”“七日来复”之说，揭示了天地阴阳的循环规律及人体的节律变化。西方人以七日为一星期暗合其理。

秋的雅称

夏吟 金 秋 时 节，秋高气爽，万物收获，粟香袭人，人们给秋以许多雅称，以示秋爱。 三秋：古时的七、八、九月份，称为孟秋、仲秋、季秋，简称“三秋”。也指秋季的第3个月，即农历九月。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中有“时维九月，序属三秋”之句。九秋：秋季共90天，简称“九秋”。张协的《七命》诗中有：“希三春之溢露，溯九秋之鸣蜩。”金天：按“五行”推演，秋属金，故称金天或金秋。唐代陈子昂诗曰：“金天方肃杀，白露始专征”。金素：谢灵运诗云：“述职期暑暑，理掉变金素。”李善注：“金素，秋也。秋为金而色白，古曰金素也。”素节：又称素秋，有时专指重阳节，有时则泛指秋天。宋代欧阳修诗云：“我来夏初，素节今已届。”素商：按古代“五行”说法，秋天色尚白，又属“五音”之中“商”的音，故有素商之称。元代马祖常《秋夜》诗云：“素商凄清扬微风，草根之秋有鸣蛩。”西陆：晋代司马彪《读汉书》云：“日行西陆之秋。”西陆即二十宿中的昴宿之别名。 此外，秋还有凄辰、高商、商节、白藏等雅称。

跟 踪

侯发山 大街上车来人往，骑着摩托的巡警“日”地声下来了“日”地声去了，男孩敢对自己下手？再说，自己人高马大的，就不一定不是小男孩的对手。大卫转念一想，自己又没把钱带在身上，小男孩没有必要跟踪自己啊？还是小男孩眼底下有什么了辨认自己，以便日后动手？前不久县城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件，两名初中生为了上网，在一个偏僻的胡同里，用棍子打昏了一个收破烂的大

跟 踪

大卫的心情不错，一边开着洒水车，一边哼唱着“今个儿咱老百姓，真呀真高兴”，虽然他唱得五音不全找不着调儿，但自我感觉良好，他是真的高兴。因为大卫买彩票中了50万，他没有理由不高兴。 在得知买彩票中了50万后，不到一个小时，大卫和老婆就计划好了这50万元怎样开销：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连同装修在内，预计40万，其余10万存起来，以备家庭一时急需。幸亏是50万，要是500万，大卫都不知道该如何花了，能有这么高兴？ 大卫跑了三条马路后，突然发现一个十多岁的男孩骑着一辆送牛奶的自行车跟着他。因为洒水车后面喷着水，其他车辆都是东躲西藏，只有小男孩若即若离地跟在洒水车后面。难道是洒的水溅湿了他，他撵上来要跟我算账？要么是小男孩要撵上自己，让自己订他的牛奶？是自己或是老婆乡下哪个亲戚的孩子？想来想去，所有乡下的亲戚中也没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

“书怀同志是县长，一样嘛。”王雨平主报告结束后，还穿插了玉林一达说着，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接起了电话。

杜光辉回到办公室，又给据书怀县长打电话。据书怀不在，杜光辉又打他的手机，没人接。杜光辉心里有点急了。会议议程安排上写着县主要领导指示的，而且，杜光辉也希望他们过去。主要负责人参加，是对事情的重视。没有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往往就带有很强的部门性，缺乏全局性。

不仅仅林一达，据书怀也联系不上。会议定在九点，现在是八点三十，杜光辉只好往会场去了。会场设在县委招待所的会议中心，副县长王雨平和两办的分管副主任都已经在旁边的休息室等着了。

杜光辉问：“都来齐了吧？”党办的主任说：“下面的都到齐了。县直还有个别单位没到。”“啊，还有五分钟嘛，再等等吧。按时开会。”杜光辉问王雨平，“书怀县长，你看见了没？”

“没有。早晨好像到办公室去过。听说要下去吧。”王雨平答道。“啊。”杜光辉望着王雨平，心事重重地应了声。

九点到了，毛主席问杜光辉：“杜书记，是不是？林书记？”“林书记有事不能来了。开吧！”杜光辉道。一行人从休息室到了会议室，主席台上的席卡，还设着林一达的。杜光辉让人拿了，他刚刚坐定，据书怀电话来了，说：“不好意思，刚才没有听见。我到林山矿了。是不是茶叶会的事啊？不是说好一达书记参加了吗？”

杜光辉拿着手机，到了休息室，说：“一达书记临时有事。原来想请书怀县长来强调的。可是……”据书怀说：“那不好办了。林山矿回到县里要一个多小时，我来回一跑，你的会也结束了。就你强调吧，你是副书记，又是主抓茶叶的，你强调最合适。”

杜光辉说：“现在也只好这样了。”回到会议室，他调整了一下会议的议程，原来定的由杜光辉主持，王雨平做主报告，林一达最后指示；现在改成了毛主席主持，王雨平主报告，杜光辉最后作指示。

他和我一起分析剧本，帮助我揣摩角色，给我讲老北京的传统文化，带我练习台词，像“提溜”、“寻个宿儿”、“装什么丫挺的”这些京腔京韵的俗语，他一句句教我吐字归音，让我放下心理负担。他像一个最有耐心的老师，面对着一个不那么伶俐的学生。我有时候做得不到位，很怕他“叱儿”我，按理说一家子，彼此脾气大点儿也正常。但他从来不会这样做。他担心自己如果不能控制情绪，对我太严厉了，我会更加失去方向感。

我不能让远征脸上无光，不能辜负剧院领导的信任，更不能辜负自己多年的等待。“我一定要演好！加油！” 有一天谢幕后，我在后台卸妆，一个平时和我很熟的工作人员打招呼：“丹妮，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演出啊。”“哦？是刚才那场吗？哪个是你啊？”

当他听说我就是那个婀娜多姿的“水珠儿”，万分惊讶，“天哪，丹妮，你居然能演这样的角色！” 著名的旅美表演艺术家卢燕当时正好在剧院，她看了这场戏，也不禁感叹：“这是丹妮演的吗？她平时多乖啊！”

19. 忘记自己的美丽，就成功了——梁丹妮 当我在影视表演方面最低迷、连续几年都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角色时，远征曾经说：“幸好你还有人艺，幸好你还有话剧。”的确，在人艺，我经历了一些与过去天壤之别的角色，她们让我寂寞，茫然，痛苦，矛盾，但也逼迫我正视现实，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有一场根据老舍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叫《开市大吉》，我在其中饰演“汪大”慕凤珍。这是我在话剧舞台上遇到的最艰难，也最另类的角色。她原是一个肥胖、跋扈的阔太太，在两个骗子屠夫的撮掇下去做了整形手术，变成了一个身材窈窕、装扮古怪的女人，颇具荒诞色彩。

坦率地说，这样一个角色，剧院院的一线女演员是不会演的。但如果让一个不够优秀的人来演，又根本完成不了角色要求的巨大反差。远征当时出去拍戏了，不在北京。我打电话向他诉苦，他说：“要不，你看看老舍的漫画吧，或许能

受到一些启发。”于是，我从书架上找出朱德庸的《涩女郎》，从中参考那些胖太太的一举一动，借鉴人物的动态、静态，翻来覆去，好像真的找到了一点儿感觉，而且慢慢地把那些顾虑、面子、自尊全都抛到了脑后。我决定，照着漫画演。

第二天，又到排练厅，我找了一件大肥袄套在身上，在台上“横着走”，还没忘了远征给我的点子：胖人通常腿短，为了表现“汪大”的滑稽，我一坐在椅子上，就脚不沾地，两条小腿来回地晃。导演说：“丹妮，你一定做了很多功课，现在全对了！” 这种挑战对我而言是残酷的，它完全颠覆了过去几十年中我对自己的认知。但是我相信，作为一个长得并不难看的女演员，如果连真正的“丑角”都能演好，让魅力发自角色本身，那么，我就可以无所畏惧了。在掌声中，我想起远征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一个女演员，如果忘记了自己的美丽，你就成功了。”

20. 怨妇，悍妇——梁丹妮 在《男人底线》中，我出演了一个婆婆妈妈的护士陶爱华。濮存昕演我的丈夫，许晴演他的情人。有这么一场戏，陶爱华知道丈夫有外遇后，精神恍惚，险些给病人吃错药。她和丈夫的结婚纪念日这天，丈夫为了掩饰自己的“外遇”，在家中张罗了一桌酒菜，她却直截了当地叫丈夫“别装了”，随即主动提出离婚。

这无疑是“大场”激情戏，将极其耗精力和体力。那天早上6点，我就把远征叫起来，让他匆匆浏览了一遍这场戏的剧本，然后征询他的意见：“你说，陶爱华在丈夫面前，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该‘含着演’，还是‘放开演’？” 远征问我：“你自己想怎么演？” “我想含着演，不动声色地向他提出离婚。” “对，应该含着演。克制情绪，不要一开始就很激动。”远征很有把握地说。

他又接着说：“但是在某个合适的时候，你一定要爆发一次，把情绪全部宣泄出来。” 那天，我心信满满地到了片场。为了配合灯光和摄影，要先走一遍戏。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情绪毫无起伏，只是淡淡地把台词说了一遍。



秋染梁(国画) 徐雷村



洪放 挂职